

---

# 日本侵华与昭和天皇的独白

张振鷲

---

近代日本侵略中国 70 余年,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三朝。以征服中国、独霸中国为终极目标,明治时代起步,打基础,大正时代争雄,巩固和扩大阵地,昭和时代从步步紧逼进而全面发动进攻。祖孙三代一脉相承,以昭和一朝为登峰造极。历来的侵华政策的制定、执行,主要在日本政府、军部,这是世所周知的。至于天皇本人起了什么作用,他们的态度如何,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动作,这些问题一向讳莫如深,言人人殊。这主要是因为直接资料极为难得,知真情者甚鲜,缺乏有力的人证物证,以致这些问题长期成为历史之谜。

现在,关于昭和天皇终于有了直接资料,作证者就是他本人,证言就是他的《独白录》。

《昭和天皇独白录》最初公布于日本影响颇大的综合性刊物《文艺春秋》1990年12月号<sup>①</sup>,已在昭和天皇“独白”44年之后。这个“独白”,称为“自白”更为确切,因为那并不是一人独处,旁无他人,自言自语;而是深居宫禁,关起房门,一人道白,近臣聆听——这近臣也就是他朝夕侧近的五名心腹,所以他道出的完全是他的心声。“独白”的主题是“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从其远因、近因、经过一直讲到“终战”(日本投降)等种种事情。所谓大东亚战争,就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延伸与扩大,因而这个“独白”必定涉及中

---

<sup>①</sup> 国内《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3期胡晓丁《新发现的〈昭和天皇独白录〉》做了评介性报道,第8、9两期连载胡晓丁、贾宝波译《独白录》全文,可惜译文颇有不甚确切处。本文引用《独白录》皆经邹念之同志参据原文做了校订,又承他对本文提出许多指正,谨致谢意。

国以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事情的确正是这样，昭和天皇一开口讲“大东亚战争的远因”，就把有关中国的事拉了进来，他说：

究其原因，实已潜伏于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条约的内容之中。日本所主张的人种平等方案为列强所不容，黄白种族的差别感依然残存，如拒绝日本向加州移民等等，已足够激怒日本国民，而强迫归还青岛亦是如此。

所谓日本所主张的“人种平等”方案，指的是1919年巴黎和会时日本在国联盟约起草委员会上要求载入盟约的一项原则。日本提出此一原则，实际上是为迫使美国总统威尔逊同意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我国山东省的侵略权益（主要是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等）转让给日本而做的一种战术上的“佯攻”。<sup>①</sup>这个问题超出了本文的主题范围，所以不拟多说。这里要指出的是，所谓“归还青岛”，根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条约”无关；相反，凡尔赛和约是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都转给日本的。正是这种无理规定激起中华民族全民的义愤与抗争，直到华盛顿会议期间经中日两国代表在会外直接谈判（这是日本的主张），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日本才同意将其强占已近8年的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日谈判有英、美代表列席，昭和天皇的所谓“强迫”，意即指此。说“强迫归还青岛”也“足够激怒日本国民”，使人感到正是这位独白者本人心有余愤。他把日本强占中国领土与中国争取收回领土的斗争归于日美矛盾，这就完全歪曲了这件事的固有性质，掩饰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华盛顿会议时他刚刚以皇太子奉命摄政，日本不得不将青岛归还中国一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致过了24年之后他竟在这件事上找“大东亚战争的原因”并诿责于他人，这反衬出他当初对日本占据青岛是多么迷恋。由此看来，在他嗣位为天皇后的第二、第三年（1927—1928年）一再裁可日本出兵山东，侵入青岛、济南诸地，也就使人更加容

<sup>①</sup> 参阅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7—528页。

易理解了。

接下来《独白录》谈到“炸死张作霖事件”：

这一事件的主谋者是河本大作大佐。最初，田中(义一)总理对我说，此事甚为遗憾，在河本指使下被炸死的张作霖，虽系自封，但毕竟是一个国家的地方当权者，因此，准备处罚河本，以向中国表示憾意。后来我又听说，田中就此事曾对牧野(伸显)内大臣、西园寺(公望)元老、铃木(贯太郎)侍从长说过，他打算召开军法会议，彻底惩处肇事者。

然而田中将惩处问题提交内阁会议讨论时，据说以铁道大臣小川平吉为主的一些人认为，从日本的立场考虑，惩处甚为不妥；这种论调声势很高，因此，内阁会议也就不了了之了。

于是田中又一次来到我处，说打算把这一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加深究。此话与他上次所言大相径庭，因此我厉声对田中说：这么说不是有违前言吗？你是否应该提出辞呈！

今天想来，这种言辞说明我当年过于年轻气盛。但毕竟是这么说了，田中因此提出辞呈，田中内阁也总辞职了。事后听说，当时河本曾扬言，如果召开军法会议进行审讯，他就将日本的策谋全部暴露出来。因此军法会议被取消了。

这段话表明，昭和天皇对谋杀张作霖一事的底细是清楚的。他申斥了田中义一，并要其提出辞呈，看来是够严厉了。但是惹他震怒的是田中第二次向他说的话与第一次说的“大相径庭”，而非其他；他并没有要田中去履行前言，“处罚河本，以向中国表示憾意”。田中辞职，滨口雄幸内阁成立，他也没有要新总理去这样做，事情的结局还是如田中第二次对他说的那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加深究”。换言之，他辞退了田中，却接受了田中的这个意见。既然如此，当时申斥田中当然就是过分了，这使他产生悔意，18年后追述此事仍有“过于年轻气盛”之憾。他自称由此得出的教训是“从那次事件以后，我就下了决心，凡是内阁提出的上奏，即使我持有反对意见，也予以批准”。这也可以说就是放手让下面肆意妄为了。于

是三年以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

然后谈到1932年的“一·二八”，《独白录》中称为“上海事件”：

在上海，将战区限定到那种程度，防止了事件的扩大，这是白川（义则）大将的功劳。3月3日实现了停火，但这并不是依据奉敕命令，而是因为我特地命令白川不得扩大事态。

昭和天皇在这里为自己表功了，因为“在上海将战区限定到那种程度，防止了事件的扩大”既是白川的功劳，而“特地命令白川”的是他，可见白川的后面首先是他的功劳。“命令白川不得扩大事态”不仅是一个军事决策，也是一个政治决策。他没有说明做出这个决策的原因。不过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目标本来就是有限的，而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以致屡易统帅，当白川被任命为第四位侵华军司令时，客观形势实际上已不容许日本再扩大战争，所以在保证能达到基本目标的情况下“将战区限定到那种程度”就成为势所必至了。这其实是日本不得已而为之的。

继“上海事件”之后再谈到中国，就是所谓“支那事变”即从卢沟桥事变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了，在这个题目下他用了较多的唇舌：

1937年初夏时节，华北地区中日间的对立日趋尖锐，宋子文操纵下的税警团包围了天津。

这支军队虽然名义上只叫税警团，实际上是拥有新式装备的精锐的宋家的私兵。

因为日中关系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我总想设法与蒋介石谋求妥协，于是把杉山（元）陆军大臣和闲院宫参谋总长召来。……向他们征求对华的意见。

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果陆军的意见与我一致，我将告知近卫（文麿），叫他与蒋介石谋求妥协。因为满洲毕竟是偏远地区，即使出了事也不致闹成什么大乱子；如果在天津、北京闹出事来，就势必遭到英美的强烈干涉，彼此之间有发生冲突的

危险。

当时的参谋本部,实际上处在石原莞尔的控制之下。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对将来的预见是:只要在天津给予一击,事件即可在一个月之内得到解决。于是我心里明白了他们的意见是与我并不一致的,所以我没把妥协的事说出口来,实深遗憾。

“支那事变”从“宋子文操纵下的税警团包围了天津”说起,这是很不寻常的。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看到过一位历史学家或一本历史著作这样叙述,这可以说是昭和天皇的一个独创。但这个说法是令人起疑的。第一是他所说的史实令人起疑。1937年夏这个时间距所谓何梅协定的成立已近两年,说这时有中国中央系统的军队进入天津,而且“包围”了天津(这需要很大数额的军队),这是极不可能的。我查了不少有关史料,又请教了一些对这段历史颇为熟悉的学者,一直没有找到这样的记载。当时税警团确实有一次调动,那是在青岛。青岛胶澳盐区本来有税警团一个营驻防(税警团的任务主要是盐务缉私),由于该盐滩产量增加,加以食盐加税,国民政府财政部为严防走私,于1937年5月2日将原驻的一个营调回海州,另调税警第五团填防。这本是一次正常的调动,日本却就此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青岛日本报纸造谣煽动:新到青岛的税警团人数不过千余,它们夸大宣传为一两万,并说此事使当地日侨感受威胁。日本驻青岛领事向市政府提出抗议,日本驻南京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日本外交、军事官员(包括外务省官员、驻南京使馆官员、驻济南总领事、驻青岛领事、第三舰队司令官、天津驻屯军军官、海陆军武官等)群集青岛,商讨华北政情及侵华策略。<sup>①</sup>这在当时很增加了一些紧张气氛。我颇怀疑昭和天皇误把青岛说成了天津。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出于记忆之误,还是其他原因?如果

---

①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26年(1937)1—6月份。台北国史馆印行,1985年6月出版。第418页、483—484页、498页、509—510页、598页、616—617页。

是记忆上的错误,何以说得那样具体而又夸张?这就使人产生第二个怀疑,即其动机及目的了。众所周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军队挑起的,华北危机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中日战争的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于今昭和天皇提出,在“七·七”前夕,中国军队(而且是“拥有新式装备的精锐”之师)“包围了天津”,中日关系出现“一触即发”之势,那么“支那事变”的源头就始于中国向天津出动大军,责任就在中国了。此其一。其次,税警团是隶属于中国政府财政部之下的,当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时,该团可以说是隶属于他,但此时(1937年)他已不是财长,说该团是他“操纵下的”已不妥,而昭和天皇不仅仍这样说,还强调该团“实际上是……宋家的手兵”,这就不免使人感到话外有话。而世所共知宋子文是有名的亲英美派,那么天皇的言外之意好像就是这样的:税警团增派到并包围天津有着英美的背景。——联系到下面所说“如果在天津、北京闹出事来,就势必遭到英美的强烈干涉”,更使人感到有这种暗示。《独白录》每每把中日之间的问题直接间接地扯到日美(或日本与英美)矛盾,这里又是一个例子。而从日美(或日本与英美)矛盾去解释日本侵华,就很容易把日本在中国的侵略、争夺单纯说成驱逐美国(或英美)势力,这种说法也就是近几十年来日本一些人所宣扬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核心。这样看来,在《独白录》中已经潜伏着所谓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因子了。

这里有“满洲毕竟是偏远地区,即使出了事也不致闹成什么大乱子”一句话值得注意。《独白录》中一再用到“满洲国”、“满洲国境”、“满洲国军队”等词,也提到石原莞尔“是满洲事件的策划者”,但从头到尾没有具体去谈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东三省、炮制伪满洲国以及强占热河等这样一些侵华大事件<sup>①</sup>,这反映出他在“独

<sup>①</sup> 据木下道雄日记1946年3月18日所载,昭和天皇这天第一次向五位近臣谈话中谈到“满洲事变时,军队本想越过长城一线,但被敕令制止了”。但《独白录》未载。转引自井上清《从〈昭和天皇独白录〉看裕仁天皇》一文,载日本《インパクション》(Impaction)1991年第70号第109页、114页。(吕永和同志译文。)

白”时并不认为这些事件有什么问题。这里“满洲毕竟是偏远地区”一语只是为了与“天津、北京”作对比才顺便谈及的，唯其如此，这也就最自然地反映出在昭和天皇的心目中当年日本侵占这片辽阔富饶的中国领土乃是一件没有国际风险、轻松愉快的事。

这里他还一再提到七七事变前想“与蒋介石谋求妥协”，宛然是一个妥协论者。妥协未成，发生了七七事变，他继续说道：

值此危机之际，卢沟桥事件发生了。我并不认为那是支那方面挑起的，而认为是由一些无所谓的争执引发起来的。

在此期间，战火又飞到了上海。尽管近卫仍主张采取不扩大方针，但我感到战火既然已经蔓延到上海，再防止扩大就不容易了。

当时我国在上海的陆军兵力很单薄，这是因为惧怕苏联，而不愿把兵力分散到上海。后据汤浅（仓平）内大臣告知，起初，石原曾说陆军仅向上海派出两个师团是因为政府加以阻止，而事实上却是石原本人阻止了的。我担心仅以两个师团的兵力会在上海陷于悲惨的境地，于是我曾不断地督促增加兵员，但石原仍然畏惧苏联而没有派出足够的兵力。

尽管我经常说要在威吓的同时提出和平主张，对此，参谋本部虽表赞成，而陆军省则反对。反对的大概是陆军省的军务局。至此，妥协的机会再次丧失了。

攻下南京之后，德国大使出面调停。后据币原（喜重郎）说，当时日本的提案被宋美龄扣压下来，好像没有送到蒋介石那里。再加上畑（俊六）司令官恃强逞能，妥协的良机再一次失去了。日本军遂继续向前，向武汉发起进攻。

由此看来，这位1932年上海战争时的“不扩大论者”到1937年成了真正的扩大论者，“不断地督促增加兵员”，这是极其坦率的自我暴露。另外，“妥协论者”的本质也自我揭示了出来，这就是“要在威吓的同时提出和平主张”。这个话不是偶尔说说，而是“经常说”，因此这也就不是偶一为之的权宜之策，而成为一种基本策略、

一种规律。说是“同时”，其实运用起来只能是“威吓”在先，“提出和平主张”在后。所谓“攻下南京之后，德国大使出面调停”，就是一次典型的运用：日本对中国“威吓”（向南京发动军事进攻）、“提出和平主张”（通过德国大使提出苛刻的“和平”条件）、再“威吓”（攻下南京）、加码“提出和平主张”（提出更苛刻的“和平”条件），可以说是娴熟地贯彻了昭和天皇的这个策略思想。<sup>①</sup>而这并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在整个日本侵华战争中，这个把饵食挂到刺刀尖上以逼降诱和的昭和策略是用得不少的。

当时日本的提案“好像没有送到蒋介石那里”，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南京陷落前，蒋曾亲自接见传递日本“和平”条件的德国大使陶德曼，对日本的提案已有回应。关于这个情况，昭和天皇已由外相广田弘毅的奏报中得知，当时还面浮喜色地点头说“那好哇”。<sup>②</sup>南京陷落后，陶德曼于12月26日将日本新的“和平”条件交给孔祥熙。当天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道：“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27日国防最高会议讨论日方的条件。28日蒋又约集汪精卫、孔祥熙、王宠惠等商谈，结论是对日本的条件不予理会。1938年1月2日蒋氏日记载：“倭寇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当即严词拒绝作答。”<sup>③</sup>由此充分证明日本这个提案也是很快就送到了蒋那里，并没有“被宋美龄扣压”，这一次中国政府的回应，广田必定也会奏报昭和天皇。何以事隔刚八年，他竟把由广田的正道得来的报告抛开，而引用币原不知从哪条小道得来的消息，把事情说成“被宋美龄扣压下来”了呢？

① 在此之前，“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后不久，8月18日（正值他不断督促增兵时）昭和天皇就问过军令部总长及参谋总长：“有否在集中兵力于重点，施以严重打击之后，以我公明之态度倡导和平，从速收拾时局之方案，即促使支那反省之途径？”转引自（日）吉田裕著、吕昶译《昭和天皇独白录》与东京审判，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9期，第47—48页。

② 《文艺春秋》1990年12月号第106页解说。

③ 古屋奎二编著《蒋总统秘录》全译本第11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第98—100页，第103页。



把不实之词加于宋美龄，与前述加于乃兄宋子文相对应，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独白录》在谈到日军“向武汉发起进攻”后，认为“支那事变终于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淖之中”，“处理支那事变的前景已根本无法预测”，陆军省为转移国内的视线，想出一个移花接木之策，企图用新的日德意三国同盟使国内的同仇敌愾之心转向英美，把“支那方面的问题遮掩过去”。侵华战争当然还在继续，但《独白录》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述却到此结束。其后再谈到与中国有关的事就是1945年春的所谓“缪斌问题”了，昭和天皇是把它作为小矶国昭内阁所面临的三个问题之一加以评述的：

这是一个身为一国首相的人要就日中和平问题和一个名叫缪斌的素行不明的家伙进行接触的问题。

重光(葵)从前认识缪斌。他是曾追随汪(精卫)行动与共、后又弃汪而去的 not 义之徒。尽管当时日本正濒于危机，处于溺水者不择援手的状态，然而身为一国的首相，竟然妄图凭借诸如缪斌之辈的力量来实现日中两国的全面和平，也未免过于乏识浅见了。

缪斌是搭乘日本陆军的飞机来到日本的，杉山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呢？实在令人费解。不过，他的来日是在朝日新闻记者田村(真作)的劝说下，由绪方竹虎策动的。

他并没有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本来，对重庆的工作是完全交由南京政府去做的，日本这一直接插手，其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背信弃义的行为。况且，身为一国的首相，对一个未带亲笔信来的人施行谋略，即使成功，也会丧失国际信义；不成功，更将贻为笑柄。

关于这件事，木户、梅津、重光、米内、杉山都表示反对。我也极力反对。所以，我特召小矶来见，直截告诉他和这样的人打交道颇不适宜。米内、杉山也事先向小矶表明了同样的意见。因此，小矶才下决心中止了和缪斌的交涉。

“缪斌事件”就这个失意的汉奸政客来说是一场政治骗局，而在日本政府方面确实成了笑柄。昭和天皇反对此事确很坚决，什么原因呢？一是对缪斌其人厌恶、不信任，因为他“素行不明”、是一个“弃汪而去的 not 义之徒”，又“没有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靠不住；二是基于对南京伪政权（当时汪精卫已死，陈公博为头目）的信义，“本来对重庆的工作是完全交由南京政府去做的，日本这一直接插手，其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背信弃义的行为”。《独白录》另一处在讲到东条英机任总理时说，“他兼任参谋总长之事和设置大东亚省之事，是我所不能赞成的。但其他的事，例如他要遵守与支那之间的约定等，却又是好事”。所谓“与支那之间的约定”，大概指的是1943年1月在汪伪政权向英美“宣战”时日本与它签订的“共同宣言”及“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等，昭和天皇称赞东条“要遵守”这些约定是好事，也就是赞扬日本加强对汪伪政权的支持及扶植。他在“独白”中没有直接谈到日本在中国炮制傀儡政权的问题，但他评议东条的这段话，特别是他关于缪斌问题的论述，清楚地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态度：他很注意对为日本优华效劳的汉奸头目及汉奸政权讲信义，关怀他们就像聪明的主子关怀忠实的奴仆那样。<sup>①</sup> 不过，另一方面，他的另一段话又表明，在一定情况下，如果必要，把奴仆抛弃掉也是无所顾惜的，这就是他说到日本在投降前曾想通过苏联的调停来讲和，为刺探苏联的意向，拟定了条件：“如果它答应让我进口石油，那么将库页岛南部和满洲都给它也可以。”在当时，将“满洲”拱手送人，也就是出卖“满洲国”，这样一来，对那些比汪精卫之流的资格还要老的汉奸傀儡们的“信义”、关怀等等当然就都不存在了。

《独白录》还有几处零星地谈到中国，都是日本侵略者日暮途

<sup>①</sup> 《独白录》中谈到没有主动更换东条内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东条一直和大东亚各地的人们有所接触，所以，如果无视这一点而更换内阁，恐将很难笼络住大东亚的人心”。这“大东亚的人心”当然包括汪精卫之流的“人心”。

穷时的事了：

冲绳失败后，海上作战已毫无希望。我认为仅有的一线希望是，如能与缅甸作战相呼应，向云南发动一次攻击，或可给英美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我曾以此意向梅津讲过，他认为给养难继而表示反对。……于是，这事也无疾而终了。云南作战既已没有希望，于是我便横下一条心：除乞和之外，已别无他途。

(1945年6月)梅津从满洲回来了，据他报告说，即便以我方在中国的全部兵力，也只能对抗美方的八个师团，倘若美方派出十个师团在中国登陆，我方绝无取胜的可能。梅津说出如此软弱的话，这还是第一次。

在日本侵略者已到走投无路的关头，昭和天皇还在寻找那一线希望，提出“向云南发动一次攻击”，这的确生动地表现了他的“战斗不屈的大元帅”的面目<sup>①</sup>和军事决策上的主动性。其实，日本早已打过云南，而且占据了畹町、芒市、龙陵、腾越(腾冲)各地，后来又被中国军队赶了出去。这些都是“冲绳失败”以前的事。“冲绳失败后”，即使真的再打云南，显然也是力不从心了，昭和天皇的想法未免太不自量力，所以连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也不敢领命。值得注意的是他说打云南是要“给英美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可见他心中在想着打中国的领土时，眼里并没有中国，而只有英美。同样，根据梅津的报告对中国战场的未来发展做估计，也只计算可能登陆的美军，而无视中国军民的力量。然而，既然昭和天皇想到“与缅甸作战相呼应”，何以记不起正是经过在缅甸作战已充分证明中国军队完全可以战胜日军呢？

以上就是《独白录》中关于中国以及中日关系的全部论述。从整体上看，一方面可以看到昭和天皇在战争结束后不久(1946年3—4月)就战前及战争中日本侵华的一些问题所做的自我揭示具

---

<sup>①</sup> 《文艺春秋》1990年12月号第135页解说。

有相当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可与历史记载互相补充、印证，如他对1937年日军侵略上海之战的态度<sup>①</sup>、他对汉奸汪精卫及其伪政权的态度<sup>②</sup>等等都是；另一方面，他关于日本侵华历史的回溯过于零星、简略、不成系统，特别是对于日军进攻武汉后的战局演变以及他本人屡屡督促加强进攻（例如有一段时间一再督促进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sup>③</sup>）等概未触及，显然回避了许多侵华问题。但无论如何，即使他这有限的自白也足以证明他与日本侵略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牵连，在对华威吓、妥协、战争扩大与否等各重大问题上他都有自己的主张，并不断干预有关的军政大事，自做决定，甚至直接“特地命令”战区统帅去执行。他决不是一个凡事均按辅弼者的进言行事，对内阁、军部的上奏不论同意与否一概批准的纯粹的“傀儡”或消极角色；相反，每遇重大问题需要最终裁决时，不论军部平素如何跋扈甚至有时想挟制天皇，只要有天皇的一声“严命”颁下，他们还是不敢悍然违抗到底。这也就是日本天皇制军国主义的特点所在，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天皇的积极作用。此外，从1926年到1945年，日本内阁、军部都多次更迭，而日本对华侵略始终不变，昭和天皇无疑是日本侵华基本国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的唯一维系者。总之，综观昭和一代日本侵华之所以能愈演愈烈以至于肆无忌惮，昭和天皇本人是负有责任的，《独白录》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① 这里他自称曾“不断地督促增加兵员”，而当时他曾发布敕諭，称赞“上海作战部队将士同海军密切合作，英勇奋战，果敢出击，杀伤大批敌军，使皇威宣扬于世界”。转引自陈正志著，李玉、吕永和译《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第12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② 1944年8—9月间，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对重庆实行政治工作”，当总理小矶国昭等将实施纲要及方案上奏昭和天皇时，天皇提出种种质问：“有成功的希望吗？”“同国民政府（指汪伪南京政府）特别是汪主席之间的关系是否合适？”等等。见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第1174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这与《独白录》谈到缪斌问题时的有关论述精神完全一致。

③ 如1940年11月30日他曾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不能到重庆吗？”1941年3月2日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对重庆采取积极行动吗？”等等。转引自藤原彰《日美开战后的日中战争》，见刘大年主编《中日学者对话录——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文集》，第282页，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

《独白录》洋洋近三万言，内容涉及昭和前十九年日本内外关系的广泛问题，而就其主题思想来说，可以说是昭和天皇在所谓大东亚战争责任问题上的一篇辩解书。他把日本一步步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的责任一概推给别人，推给军部和政府，强调他自己“作为立宪国家的君主，必须同意政府与统帅部一致的意见”，表白“宫廷内部是竭力亲英美的”，等等。《独白录》所总结的日本对外关系的主线和核心是对美关系，中日关系在其中只是作为一个引子，而且往往被置于日美（有时是日本与英美）关系的大格局中。《独白录》所反映的昭和天皇心目中的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一个与日本对等的主权国家，而只是日本可任意对待、主要是供其侵略的一个对象；日本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存在，日本对中国的一次次侵略，被描述成一件件平平常常、自自然然的事，日本在华的任何动作，只要不引起英美的干涉，不触发与英美的冲突，就不必有丝毫顾忌。《独白录》完全不理睬 1945 年以前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问题，对日本长期侵略中国没有流露出一点悔意、歉意或反省之意。这实际上也就是 1946 年昭和天皇做“独白”时的心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